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主编 / 张志扬 余虹

鲁枢元

狷狷言说

关于文学、精神、生态的思考



社

学
人
文
社
会
学
社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猗言说

——关于文学、精神、生态的思考

鲁枢元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主编 / 张志扬 余虹

鲁枢元

猗 猗 言 说

关于文学、精神、生态的思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猗猗言说:关于文学、精神、生态的思考/鲁枢元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ISBN 7-80149-445-8

I. 猗… II. 鲁…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5417 号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猗猗言说

——关于文学、精神、生态的思考



著 者: 鲁枢元

责任编辑: 张 原

版式设计: 辛 诤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3.25

字 数: 294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445-8/B·068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6-22-90/09

题 记

1987年9月16日清晨，在“罗马俱乐部”的诞生地：意大利林赛（Lincce）学院。

院长弗朗西斯科·加勃里耶利对我说：“猞猁，是我们学院的图腾。在意大利语中，林赛（Lincce）的字源就是‘猞猁’（Lynx）。”“猞猁是一种富有灵性的动物，有着锐利的目光、敏捷的四肢，既善于觉察到环境中细微的变化，又能够迅速地付诸行动。”

人类思想原野上的那只“猞猁”，如今你在哪里？

1999年12月31日，海南岛

· · · · ·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总序

南冥有木，彷徨
乎无为其侧

我们经历的变化，恐怕算得上 3000 年之衰变：从有“辉煌”历史的封建社会向没有“辉煌”历史的现代社会转变。有人言，一个人的成长期要缩影般地重现他的史前史。又有人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两句话似乎特别适合 20 世纪 100 年。也就是说，只要活在这个世纪，漫长的中国历史也就在将来机缘的吸取中都活过来了，可以成人。我们是有幸的。

然而，那么多仁人志士，在文化史上所留给我们的记录，问题轻重结论，责任消长磨难，如此周期失衡以至我们不敢做传火之薪窃仁人之名，只有退避天涯以求偏隅之安，把“学问”二字做成“贴己”而已。

所谓“贴己”，不是“私房话”，说得雅一点，叫“私人语言”，不是；也不是“贴身”的“绝活”，像武林秘笈；而是“由着性子做”。

海南地处边缘，有意外的人文性质，重力不重，气压不压，阳光、沙滩、海浪，净化着文明的烟尘，少许些技术僭越的骄狂，也少许些历史怀古的忧伤，没有亡灵的召唤，没有寒热的激情，没有牡丹芍药国色天香，没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没有泰山极顶东临碣石，没有暗香浮动疏影横斜，没有萧墙刀光古刹钟声，没有小桥残阳流水人家……命脉浮浅，国粹稀薄，伤春悲秋，都不是时候，省了许多牵挂。虽然我们不是图这而来，自然的清新空气，或许淡漠了盘根错节的历史底蕴，倒也疏朗了一点思想的骨架。

“地缘学”是近千年兴起的。西方有海洋文明与土地文化的分别，直到今天，“海洋”仍然是冲淡“土地与血”的潜在抗体。

中国则早有它的属性意识：“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儒家是仁者，志在庙堂之高；庄周恐怕要算智者了，常在南冥秋水之间。

这些我们都说不上。此次海南大学决定人文学科集结首批“丛书”，虽有地缘的形式，却很难说有地缘的特征。如果硬要说出点什么，那就是上面提到的“贴己”。学问有多种做法，怎么做，全然是各人自己的事；没有受命没有传承没有挂碍的自主姿态倒是共同的。

例如，在文艺学领域，从古典文献到现代文论，从文字触觉到精神生态，各自的伸展，都有别人不到之处。

张三夕的《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按作者的说法，主要点不在于“铺摊子”——校雠学、文学史、史学史、思想史，都有案头功力的磨砺与学理的铺陈；而在于“收摊子”，即借鉴西方学术思想的方法，激发对永恒的无穷无尽的生活之流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以便在国学的根底上，写一部由问题意识引导的有“个人视角”、有“思想”的思想史。

余虹的《艺术与精神》，提出文学艺术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无足轻重，精神品质几乎丧失殆尽，这究竟是现代引以为荣的标志，还是需要警惕的病症？为了探寻当代文艺的精神性失重的根源，作者清理了三条道路：①西方现代艺术之思的道路；②中国20世纪文艺革命的道路；③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道路。谨作为未来文艺之思的“路标”。

鲁枢元的《猗猗言说》，集中呈现了作者一贯锐意探索开拓的足迹：从80年代中期的“创作心理”、后期的“文学言语”到90年代的“精神生态”，或者说，从“向内转”到“超越语言”到将“精神因素”引入地球生态系统以期为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寻求新的拯救之途。每一步，可以说都是对当时社会惯性的偏斜，像伊壁鸠鲁的“自由原子”。

耿占春的《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是“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吵”的集语。作者暗中渴慕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然而又只是一种有限个人的话语的写作，因此也是与“一个”、“日期”、“一种语言”、“一个自传式的署名”分不开的，在最简要的自传文字中能够收集到历史、理论、语言学、哲学等文化的最大潜能。这未必只是使作者发生兴趣的梦想地。

又如，在哲学领域，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实关切与开拓，到西方现代哲学的汉语解殖与言说，各自的探寻，也有别人不到之处。

曹锡仁的《中国问题散论》，从80年开始，最初关注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此追寻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而把中国文化的选择和社会发展的模式作为新的研究起点，正好表达出关切中国现代命运的人文学者治学的价值取向。

萌萌的《情绪与语式》，让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悲剧、易卜生悲剧、贝克特以及现代日常悲剧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情绪”，如何在不断地挣脱历史理性的定式寻求自己生成着的表达。这种“断裂的声音”之捕捉早在 80 年代中期就逼使作者转向现象学与欧陆语言哲学，而且还要反省作为“身体”物性的“二重情绪”同“三类语式”的交互共生性，以通往公共语言何以作个人表达的可能之途。

陈家琪的《经验之为经验》，是对我们最“上手”几乎构成我们生活的“经验”不断流失以至于变成苍白这一事实“震惊”后的思索。于是重提康德式的问题“经验何以成其为经验”与海德格式的问题“作为经验的经验是什么”。作者要像胡塞尔“面对事物本身”样的“面对经验本身”。“经验”不能按已成知识的“经”（在先）与“验”（上手）的相互匡合来理解，经验的普遍性只能在经验自身的构成（生成）中获得描述。

张志扬的《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呈现了“1989～1999”十年的主要问题与思路，其实说起来只一句话：“如何走出‘只准这样，不准那样’的本质主义与‘怎样都行，怎样都不行’的虚无主义的循环”。提出被还原了的“偶在论”，不过是一种尝试，也还只是消极的检测与防御，对包括哲学在内的现代性理论思考，只能算作前提性的准备。

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技术的图象，以至我们的思维也开始在数码与图象之间训练有“数”。或许工于计算的人有福了。

幸好人是隐含否定于自身的偶在者，他一方面要接受数

码与图象的度量而不得不规范化，另一方面，他又难免例外地要承受大地与苍穹的跨度，使那想象的空间连人不可兼并不可让度的隐私，终究守护着人可偏离的自由。或许善于例外的人有福了。

生长并传播教育的教育之地，现在有最功利的企图，没有比这更跛足短视的不幸。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以为它能靠自身的自然增长而脱去科技神话的巫魅。可是它们忘了，它们的“不完全定律”是不可能为自己寻找到“第一推动力”的，无论是宇宙的内和外。

海南的信使，但愿他有幸从世界与世界的空隙中走来，只需带着清新的空气。我们感谢这一片土地。当然也感谢海南大学注视文科的精神——“山不在高，有神则灵；海不在深，有珠则润”。

“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林中路。每人各奔前程，但都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一个人的情形和另一个人的情形一样。然而只不过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从事林业者与森林管理员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误入歧途。”

相对那些自明的“高速公路”，“林中路”常常是“误入歧途”的，所以“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

或许，这正是我们向往的吧。

“南冥有木，彷徨乎无为其侧”。

代 序

从艺术心理到精神生态

——答夏中义先生问

夏中义：看到鲁先生，就想起 80 年代，那是新时期文艺心理学的黄金季节。那时有三个人很引人注目：一是金开诚写了《文艺心理学论稿》，宣告了文艺心理学在新时期的复苏；二是吕俊华写了《变态心理与艺术创造》，显示了文艺心理学方法与观念的同步变奏；三是鲁先生的《创作心理研究》和《文艺心理阐释》两本书，表现了文艺心理学学科重建的自觉意识。这就是说，当学界在 1985 年这一“方法论年”争论为何要用新方法来研究文学时，鲁先生已经领先一步，已在用心理学方法来研究艺术创造心理，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请问鲁先生是怎样跨出这超前一步的？

鲁枢元：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做些什么学问，冥冥之中可能有一定的限数。有人治文学史，有人搞创作论，有人研究文艺美学，有人从事版本考订，一个人并非什么学问都能做的。也许只有某一类学问对他最有吸引力，从性情上更适宜他。

我是在一种完全不自觉的情况下走进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的，知识准备不足，治学方向不明，似乎是在“下意识”的支配下潜入了这个颇有些神秘的领域。这和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国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关。那时，所有书店里找不到一本心理学的书，我跑了三家图书馆借不到朱光潜

的《文艺心理学》。学术贫乏的时代倒也为学人提供了成功的机会，我一直认为自己是钻了这个“空子”。

我是文革中的“老五届”，在我的前后几届同学中，一些人从政去了，更多的人在中学教书，有些至今还留在贫困山区。我在我的同学中是一个例外，一个散兵游勇。1972年春天，我被分配到附属在一所小学里的“师范班”教书，避开了时代的风雨，教学任务不轻也不重，有时间读一些书，甚至还从封存的“禁书”中找到一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R.S. 吴伟士的《现代心理学派别》，使我大开眼界。但即便这样，我也没有想到日后会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

但是，当“四人帮”垮台以后可以发表文章的时候，我撰写的第一篇论文就和文艺心理学有关，题目是《知觉、直觉与艺术创造》，时间大约 1977 年。文章很长，结构也比较松散，投寄《社会科学战线》后被退了回来。第二年，在河南的文艺刊物《奔流》上，我发表过两篇随笔：《漫谈情感》、《论小说家的“看着写”》，讲到情感的积累与作家的心理视觉、内视觉，都已表现出浓重的文艺心理学气息。

我和金开诚先生不大一样，他比我年长，又一直在中国的最高学府任教，知识准备比我充足，理论训练比我正规，治学方法更理性、更严谨。而我完全从自己的兴致出发，被自己的情绪涌动着向前。直到 1981 年撰写《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时，才突然明白自己搞的是“文艺心理学”，从那以后，才具备了您所说的“学科意识”，那时我已经 35 岁了。

回想起来，我最初的学术研究活动有点像“梦游症”。“梦游”，说得好听一点也可以叫“神游”，“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我起码是真诚的。论创作心境、论艺术变形、论心理定势、论神韵与格式塔一系列文章就是在这种“神游”

中完成的。

从主观心理结构上讲，我大约属于荣格所说的“内倾直觉型”，这样的人对于文学艺术中的心灵活动更为敏感些。从客观实际上讲，建国以来的文艺创作理论中的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往前走，就该接近于“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您说的“文艺心理学的黄金季节”，在80年代有它的必然性。

主观上的真诚探求与客观上的时代需求的共振，使我在80年代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做了一些事情。这种“治学经验”对于今后的青年学子来说，怕已经过时了吧？

夏中义：文艺心理学作为新时期新潮文论的分支之一，应该说，无论在方法更新、观念突破、思潮规模、学人阵容、学术实绩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鲁先生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或创造者之一，在事隔十年后的今天，以过来人的身份，再来守望或重估这段历史，又有何高见？

鲁枢元：有人讲，文艺心理学是80年代诸多文艺思潮、文艺方法中影响最广泛、成效最显著的一个分支，大抵不错。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本世纪初从王国维的诗论中萌发，20年代由于鲁迅翻译介绍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而掀起一股热潮，30年代朱光潜撰著的《文艺心理学》使之初步系统化，以后，便是长达半个世纪的荒凉。“荒凉”固然可悲，但也留下了强烈的“阅读期待”，况且，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唯心”、“缘情”的，善于在“文心”中“雕龙”，具有浓厚的文艺心理学色彩，中国的诗人、小说家从血脉里也更容易接受心理学的观念。80年代初，王蒙就曾代表作家率先向文艺心理学发出恳切的呼唤。当我谈“情绪记忆”的文章在《上海文学》发表后，周介人告诉我说，文章在作家群中引起强烈反响。那时，我的朋友

林兴宅正热心于推广“科学”文艺学的研究方法，他遇到的阻力要比我大得多。

为了文艺心理学学科的重建，80年代中期，我联络了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陕西师大、北京大学、上海师大、厦门大学、河南大学的一些同道，先后在郑州、张家界召开了第一次、第二次文艺心理学研讨会。与会的主要代表有：童庆炳、王先霭、张德林、畅广元、程正民、刘焯、夏中义、杨文虎、黄鸣奋、陶东风、王鸿生、胡山林、张月等。第一次大会后，在黄河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丛书，钱谷融先生与我共同主编的《文学心理学教程》被国内许多大学用做教材，并在台湾出版了另一种版本。到了这时，国内文艺心理学研究者出版的专著、译著、论集、教材已成雨后春笋之势，不在百部之下。作为这一时期学科发展总结性的成果、近200万字的《文艺心理学大辞典》也已经编纂完毕。

新时期文艺心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是和80年代中国文学的实际生长状况密切相关的。理论是否要联系实际，我认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在象牙塔内编织一种精巧细密的理论体系，作为个人的精神操练，展现人类智慧的华彩，那的确需要很高的手艺；但因此把联系实际的理论视为低档产品则又是不公平的。从当前的学术界看，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新理论、乃至“新人类”似乎已有铺张浪费之嫌，而现实中积压的问题已经发霉发烂却仍然得不到学者的惠顾，这也是一种偏向。

文艺心理学的好处便是密切联系文学艺术的实际。在80年代，为清理极“左”文艺路线的余毒，为确立创作主体的地位，为探求创作规律的奥秘，为重估文学艺术的精神价值，为提高文学艺术的精神品位，理论家与作家艺术家共

同做出了重大贡献。那时，我的一篇题为《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的文章，其原意不过是为我的文艺心理学研究确立现实的目标和对象，没想到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理论联系实际有时也是要冒风险的。在这场理论风波中，我很感谢作家们对我的支持和声援。以往，批评家与作家艺术家总是互不相能，惟独在文艺心理学这个领域，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二者之间都表现出了最大的理解和信任。在我的学术生涯中，竟由此结交下一些创作界的朋友，为此我深感欣慰。

进入 90 年代以来，文艺心理学研究虽然仍在继续，热潮显然已经消退。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心理学研究的大背景早在本世纪 60 年代就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从冯特到皮亚杰，将近 100 年的时间里，心理学界推出一套又一套规模宏大的学说、体系，涌现出一位又一位“誉满全球”的学术大师，心理学当年曾野心勃勃地宣告，未来的世纪是心理学的世纪。但是，到了 60 年代以后，专门化的心理学成了一种技术性的操作，哲理性的心理学则消融在多元化的哲学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地位。心理学在等候新世纪春天的到来，不得不忍受这个萧条冷落的季节。文艺心理学自然也不能例外。

从国内情况看，当代中国心理学的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缺少独领风骚的学术流派和异峰突起的学术大师。在国外，文艺心理学的重大突破差不多总是由心理学界的领袖人物推动的，如詹姆斯与意识流，弗洛伊德与潜意识、白日梦，荣格与原型批评，阿恩海姆与视觉艺术，拉康与心理结构主义。中国的心理学界始终没有给予文艺心理学以足够的关注，甚至可以说缺少这种关注的眼光和能力；而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者又多是半路出家，缺乏心理学的严

格训练与完备的知识素养，若要继续深入就显得力不从心，步履蹒跚。

从学术思想的发展趋势看，以往心理学中“人本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实在主义”的观念体系、知识体系已经受到新的哲学观念的挑战。“分析哲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都是主张消解主体、抛开心灵、对心理学持否定态度的，“后现代”种种主义的传入，一下子使 80 年代的文艺心理学成了一种似乎很“陈旧”的东西。我不怎么相信“文学艺术进步”的说法，但作为理论上的探索却不能因循守旧，必须对扑面而来的时代难题做出自己的应对，只有这样，理论才可能在探索文学艺术永恒之谜时显得生机勃勃。对于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来说，这该是下一个世纪的事了。

夏中义：鲁先生刚才对本世纪中国文艺心理学的发展、兴盛和衰落，做了一次回顾。鲁先生最早是专攻文艺心理学的，重点是创作心理研究，后又转向语言美学研究，出版了专著《超越语言》，眼下又在从事精神生态方面的探讨，很希望鲁先生能谈谈导致这类学术转向的内在动因是什么？

鲁枢元：各人做学问的路子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打个比方，有些人可以从有目的地大量收集资料入手，编制一个严整的蓝图，他们往往有系统的专业知识，有宏阔的理论视野，有周密的学术框架，经多年的努力，最后奉献出一部划时代的学术巨著，就像辛苦构筑起一座庄严的宫殿一样，比如，康德、黑格尔。也还有另一类人，他们的直观感受能力好，知识涉猎面广但不一定都很系统，主观随意性较强，文体也比较自由奔放，文字更多地带着自己的性情的色彩，做学问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种树”而不是“盖房”，歌德、尼采大约属于这一类人。种树没有盖房那种严格的规范性，

说不准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发出一个新权、长出一蓬新叶。至于学术生命，一座宫殿可以存在千年以上，一棵老树也可以存活千年以上。若是把种树、盖房都看作学术研究者自己心灵活动的外射，似乎不必再就价值判断上说短道长。

我的治学方式只能属于后者。当然，我种的只是一棵不显眼的小树，一棵匍匐在地面的小草，您说的三个方面也可以看作这棵小草发出的三根枝杈。

文艺心理学中我研究的重点是“创作心理”，关注的重心又是心理反映“三项图式”中位于“社会”和“作品”之间的创作主体——“人”，我把艺术的本体看作人的心灵。在审美的领域，真诚比真实更重要，心灵比外物更重要。一旦进入人的心灵，尤其是艺术家的心灵，我才真切感到这是一个多么复杂微妙的世界，一个几乎与“宇宙之谜”一样深不可测的世界。

心灵现象中可以扪触到的，还只有“语言”。我在研究创作心理时就已经开始注意到“语言”，不过，我并没有追随时尚把语言当作“符号”“结构”进行解析，而是更乐于把它看作一种感觉、一种意象、一种流动的过程、一种变幻创生着的场。后来，我干脆避开“文学语言”的提法，改用“文学言语”。我在《超越语言》一书中所要研究的是：作家内心涌动的情绪和意象如何生成为文学语言，又进而整合为作品的。文学作品的创造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学语言的生成过程。《超越语言》一书仍然是以创作心理研究为依托的。我从来不相信结构主义能把文学言语消解殆尽，况且，文学批评的使命也不只是分析与消解，同时它还应当是整合与创生。就在我对文学语言、尤其是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几乎进入痴迷状态时，我发现了一个真切存在着的人类活动领域，那就是“精神”，一种人类心灵的创生物。如果把地球看作一